



在列宁的图书室里



在列宁的图书室里

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印

一九七八年七月·北京

本书原名《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Владимира Ильича》，作者马努查里扬茨（Шушаника Манучарьяни）曾任列宁的图书管理员。这是她写的回忆录。书中提供了一些关于列宁怎样喜爱书籍和使用书籍的情况，可供编辑出版工作者参考。

本书译者：坚夫。

目 录

难忘的一天.....	1
“有什么新书?”	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便条.....	21
列宁——读者和作者.....	40
“我这样做是应该的!”	69
值班.....	86
书籍是巨大的力量.....	94

难忘的一天

我时常回想起国家出版社的日常生活，二十年代我曾在那儿工作过，最初担任图书管理员，后来担任编辑委员会的秘书。

当时领导这个机关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一位战友——瓦·瓦·沃罗夫斯基^①。出版社占用的是里亚布申斯基^②原先的私邸，坐落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上。

出版社的工作很多。需要管理文艺作品、科学著作和政治书籍的出版，需要向群众提供精神和思想上的食粮，以便帮助群众更好地领会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教育他们如何才能将伟大而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现。

时至今日，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外表堂堂的布留索夫^③怎样顺着出版社楼梯上楼，他面容清秀，显出一副知识分子的神情。当时已出版了他的一本新诗集。绥拉菲莫维

① 沃罗夫斯基（1871—1923），苏联的革命活动家、外交家和文艺批评家。1905年曾与列宁共同编辑《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者

② 里亚布申斯基（1871—1943），俄国反动的银行家和实业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进行反苏活动。——编者

③ 布留索夫（1873—1924），苏联诗人。——编者

奇^①披着军大衣走了过去。他两眼忧郁而悲伤（他的儿子——莫斯科共青团领导人阿纳托利，刚刚在前线牺牲）。肩膀宽大的马雅可夫斯基^②喘声喘气地走进接待室来。他进来时总是手里拄着一根瘢节很多的大拐杖。他把拐杖放在我的桌旁，信心十足地说：

“我要找沃罗夫斯基！”

出版社社长的办公室里一下子涌进了三个来访者，他们的脚后跟把地板踏得咚咚响。其中一个，个子不高，淡黄色头发，穿着斜领衬衫——这是诗人叶塞宁^③……

到了1920年春天，我在出版社的日常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快下班时，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秘书处刚才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需要一个图书管理员。问能不能把你放走去做这项工作？”

我激动万分。“我能在伟大的列宁身旁工作吗？我能胜任吗？”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我踌躇起来。我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沃罗夫斯基。他诧异地说：

“您怎么啦？每个人都盼着能见列宁一面才好哩，而您现在有机会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别怕，您不是很熟悉

①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苏联作家，小说《铁流》的作者。——编者

②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编者

③ 叶塞宁(1895—1925)，苏联诗人。——编者

图书工作吗？好啦，快拿定主意吧！半小时以后，他们还要来电话。我必须给回话。您同意吗？”

“同意。”我坚定地说。

“那太好了！”沃罗夫斯基说，他和我一起感到高兴；然后，他调皮地看了我一眼，补充道：“可别翘尾巴呀！”

当人民委员会再次给沃罗夫斯基打来电话时，他回答说我已经同意了，但暂时还不能把我完全放走，因此，在开始一段时间里，我只能晚上才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室里工作。

第二天，我来到了人民委员会。迎接我的是索菲娅·波里索夫娜·勃里奇金娜。她当时主管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工作，可是由于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休假，暂时由她担任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和列宁的私人秘书。

我和索菲娅·波里索夫娜是老相识了。她知道我早就生活在党员们中间，对革命书籍感兴趣，而且做过图书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在跟勃里奇金娜谈话时提到，他现在收到的图书相当多，他一个人整理这些图书有困难，需要有个专人来管。索菲娅·波里索夫娜告诉他，她将设法物色一个合适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列宁表示同意。接着，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就给国家出版社沃罗夫斯基打来了电话……

于是，我这样就到了人民委员会。

“今天”，勃里奇金娜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

能接见您：他出去了。趁现在有工夫，我建议您去看看他的图书室。”

我走进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图书室就设在这里。我首先注意到：室内陈设简朴。图书数量不多，这也使我很感到惊奇。我觉得，列宁是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的。后来我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的每一种新书，中央书库都送一册样本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另外，别的图书馆为他订阅了很多图书，国外也寄书来。但他只把那些对他当前工作和查询问题所需用的图书留在图书室里。我看见室内有很多地图和作战地图。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摊放在桌子上。当时正进行着国内战争，领导着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得不经常使用这些地图。

在我匆匆看过列宁的图书室以后，索菲娅·波里索夫娜告诉我：我必须于明天下午四点整来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谈。

我充满了一种愉快而激动的心情：因为我将要会见的这个人，他的名字正被全世界劳动人民怀着极其爱戴和崇敬的心情传诵着。……

我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17年4月3日。那时，他已度完自己的最后一次国外侨居生活，回到彼得格勒来了。我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同志们一道，穿过芬兰车站大厅，站在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①很近的地方……

后来，在三十年代，在一次同克鲁普斯卡娅的谈话中，我曾提到我在彼得格勒看见列宁时的情景。我提醒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当时亚·米·柯伦泰^②曾送给她一束红玫瑰花和石竹花。她说：

“我当时非常激动，不知怎的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很激动。”

……明天我就要重新看到列宁了，而且还要和他谈话！

1920年3月14日，在约定的时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人民委员会会议厅的门坎。我立刻就看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刚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身上穿着大衣，看来是要外出到什么地方去。我停住脚步，不知该如何是好。人民委员会的一位助理秘书尼·格·克拉辛娜，帮我摆脱了窘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她说，“图书管理员是来跟您谈工作的。”

列宁已经微笑着向我走来，伸出一只手：

“您好！这就是说，您要来当图书管理员？”

我所有的不安心情都消失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坐下，开始问道：

“您是位专家吧？您熟悉图书工作吗？”

我回答说我没有进过专门训练班，但是我喜爱图书，并且有一些做图书工作的经验。

① 即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编者

② 柯伦泰(1872—1952)，苏联的革命活动家、外交家和作家。——编者

“您能随时给我弄到我所需要的书籍吗？”

“我将尽力做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我一眼，沉思片刻，仿佛在考虑什么似的，然后说：

“那就去看看我的图书室吧。”

“我已经看过了。”不知怎的，我突然冒出了一句。

“什么时候？！”

“昨天。”

这句话有点使列宁感到惊奇。我对他解释说，昨天晚上我就来过这里了，而且根据勃里奇金娜同志的建议，稍微看了一下图书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我的话，说：

“明天就来上班吧。再见！”

“有什么新书?”

头两年，我既在伊里奇的图书室，又在国家出版社工作。我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前半天在出版社工作，然后去人民委员会。在这儿，我便着手做图书工作：翻阅新到的图书（这些图书是定期大批收到的），把一些我认为是最需要的图书挑出来，放在那张和列宁的办公桌垂直放着的桌子上，我登记新书（为此专备了一个供登记新书的本子），填卡编目，整理书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要的书籍挑出来，从别的图书馆订阅他所需要的图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午休之后（通常是在晚上六点钟），走进办公室来。我至今仍还记得那幅令人难忘的图景。春天的灿烂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窗口照射进来。它们把房门照得通亮，列宁正从这个门口走进来。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神采奕奕地说：

“啊，图书管理员已经来啦。您好！有什么新书？”

然后，他翻阅我挑出来的图书，把其中几本放在一边。

“我把这几本拿走，”列宁说。而且每次都还补充一句：“你看看我把哪些书带到住所里去看了。”

我把剩下的图书暂时放在书橱的下层。然后把它们放

在隔壁房间的大书架上，或者送到别的图书馆去。

已经看完的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带回来。许多书上都写有批语：“列宁”，“列宁藏书”，“单独保存”，“放在列宁的桌子上”，“存入我的图书室”，等等。有时他在书和杂志的封面上写一些批示。例如：“给我的图书室配齐一套”（《全苏职工会中央理事会公报》1920年第10期）；“重印”（《外交人民委员部公报》1920年第6期，目录中《外交与银行》一文下面划了着重线）；“配套，装订，把最近的各期放在文件夹内”（《苏维埃政权》杂志1919年第8—9期）；“装订后放在单独的文件夹内”（《真理报周刊》1919年第12期）；“秘存”（《革命的俄国》1921年第10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翻阅完《苏维埃俄罗斯的电气化。1921年1月20—22日在彼得格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上克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报告以及拉姆津教授和亚历山大罗夫的副报告》一书以后，在书名下面划了两条线，并在扉页上注明：“注意：列宁藏书，存入我的图书室。”

1921年9月9日，列宁收到一本《共和国科技工作通报》（全俄冶金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学术报告简述，1921年第5分册）。书中夹着一张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写给列宁的便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便条上添写了这样几个字：“存入我的图书室，暂时放在桌子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在书中作了一些修改，做了补充，写了一些统计数字，指出印刷方面的错误。例如，他

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写道：“请看第十七页，可笑的刊误。”列宁在第十七页上对“官僚主义”一词作了订正，把它改成了“民主主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看完《莫斯科苏维埃工作概述》（国家出版社 1920 年版）这本小册子以后，在上面写了如下的批注：

“列宁

.....

着重看第七页、

第十页

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平均有三十五个委员出席，讨论问题近十个。讨论的问题可分为五类：

	(1) 政治问题	1 个
	(2) 经济问题	8 个
咄咄怪事，	(3) 组织问题	46 个
应该相反。	(4) 卫生问题	1 个
	(5) 其他问题	11 个” ^① 。

这本小册子里附着一张能说明莫斯科苏维埃全会工作特点的图表。耐人寻味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所附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35 卷第 196 页。

图表上又画了一个图表，按照他画的图表，莫斯科苏维埃应该把最大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①

列宁常常在一些书的封面上写上他对某个工作人员的请求：要他们看一下他划了记号的地方。例如，曾把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所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问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第一分册，1921年莫斯科版）一书送给斯米尔加去看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着重看看这本书的第四十页，因为这一页上引用了一些能说明1921年下半年度国家燃料资源情况的数字。

列宁写读书批注，最常用的是红蓝两色化学铅笔和普通铅笔，很少用墨水笔。

我记得，当我开始在图书室工作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请不要挪动书的位置。我已经习惯于它们原来放的位置了。”

“要是那样的话，我就无事可做了。”我说。

“回家休息去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对他说，“问题可不光在眼前这一会儿，这可是关系到整个工作的问题。譬如说，在第一个书橱里，政治书籍就和文艺书籍混放在一起了。其他的书橱也应该检查一下。”

“那好吧，”列宁同意说，“请去检查吧，也许我有些书放

^① 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197页。

得确实不适当。您想法把它们放适当就是了。不过，‘转动书架’上的书请您可不要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两个放着书刊和其他材料的能够转动的书架叫做“转动书架”（其中一个是根据他自己画的草图做成的）。它们放在写字台的两侧。

右边“转动书架”上放的是一些词典和参考资料，党代会记录，党纲和党章，《党的工作人员手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制度条例草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公报以及用各种外文写成的与代表大会有关材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收到《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历次常会的命令和决议》以后，在书中夹着的一张纸条上写了这样几个字：“参考资料，请放在转动书架上，注意。”

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20年版）一书出版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把西伯利亚西部地图和工业总示意图附贴在书中，并加以装订。装订后，也放在“转动书架”上。我想起了一件小事：这本书精装封面的书脊上压印的书名中错了一个字母，把俄语“электрификация”（电气化）一词中的字母“и”错成了“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红铅笔将字母“о”涂掉，改成了“и”。

我建议重新装订这本书。可是列宁说：“不必啦。”

这个“转动书架”上还放着弗·达里编的四卷本《俄语

口语详解词典》，德·德-维沃编的《意俄词典》，尼·亚兹科夫编的《法俄词典》，伊·巴甫洛夫斯基编的《德俄词典》，阿·亚历山大罗夫编的《英俄词典》，《基辅往事》杂志编辑部编纂的《乌克兰语词典》，等等。

左边“转动书架”上放的是一些装有当前材料的文件袋，近期的报纸和列宁当时正在研读的书籍。

列宁办公室里共有六个书橱。其中三个放在写字台的后边。一个书橱里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著作；其他两个书橱放的是一些主要版本的百科词典、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苏维埃共和国对外政策问题的书籍、军事著作、地图、杂志等等。靠右边那面墙放着两个书橱。其中一个放的是俄国和外国古典作家的文艺作品；另一个放的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国外白卫分子的书籍，存放在单独一个书橱里。

图书室里的图书都是分类放置的，每一类则是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总之，这样放法都是为了使用起来方便，能够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书籍，而不至于浪费宝贵的时间。

列宁办公室里共有近两千来本各种文字的图书。还有一部分图书，大约三千册，存放在他住所附近的一个房间里。

给列宁送来的某些图书，有一段时间放在哥尔布诺夫办公室的一个书橱里。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天决定去看看哥尔